

桑德尔《反对完美》解读：超人运动员值得期待吗？

朱彦明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随着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自我改善从原“治疗模式”升级到“增强模式”, 创造超人运动员的话语开始流行起来。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健康、公平以及违背体育精神为由禁止使用兴奋剂包括基因兴奋剂增强运动员, 但也遭到来自体育运动赛场内外的质疑。以桑德尔《反对完美》中对“生化运动员”的讨论为中心, 探讨体育运动应秉持的原则和所承载的价值。研究认为运动员对卓越的追求, 是其自然天赋和努力的结合, 如果依赖技术而不需要努力就能赢得比赛, 这将从根本上扭曲比赛, 破坏运动的本质。因此, 体育运动不应当允许基因增强的超人运动员参与比赛。

关 键 词: 体育哲学; 超人运动员; 超人类主义; 生物医学技术; 桑德尔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1)01-0033-06

Interpretation of Sandel's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Are superhuman athletes worth expecting?

ZHU Yan-m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iomedical technology, human self-improvement has been upgraded from the original "treatment mode" to the "enhancement mode", and the discourses of creating superhuman athletes have become popular. Although WADA bans the use of doping, including gene doping, to boost athletes on grounds of health, fairness and against the sports spirit, they are also questione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rena. This paper takes Sandel's discussion of "Bionic Athletes" in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as the center, and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values that sports should uphold. Athletes'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a combination of their natural talent and efforts, which will fundamentally distort the competition and destroy the essence of sports if they rely on technology without effort. Therefore, sports should not allow superhuman athle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 superhuman athletes; transhumanism; biomedical technology; Sandel

2012 年《自然》杂志上刊登一篇题为《超人运动员》的论文, 认为利用药物、非治疗性的基因转变来提升运动成绩, 我们就可以期待运动赛场出现“超人运动员”^[1]。这种创造超人运动员的话语, 在近年来的运动话语中并非孤例。2004 年苏格兰佩斯利大学学者米阿(Andy Miah)^[2]在其《基因转变的运动员》一书中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在当前的科学条件下, 创造以 5 秒或 6 秒刷新百米赛的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 创造有着消耗不完耐力的远动员也是滑稽的。但如果利用新生物医学技术对人进行基因改造, 增强运动员体

能, 提高运动成绩, 未来的竞技体育赛场就有可能出现超人运动员。在增强运动员能力的问题上, 米阿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 但也引发很多争议。本文通过梳理创造超人运动员的可能条件及相关争议, 以美国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反对完美》为中心, 对“超人运动员”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 创造超人运动员与相关争议

创造超人运动员的思想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崛起的一场知识和文化运动, 即“超人类

主义”^[3]。简单说,超人类主义就是利用新技术对人的体能、智力、情感、道德等进行改善或增强的浩大工程^[4]。由于超人类主义将医学上“治疗模式”升级到“增强模式”,即对人类身心进行改善或增强,所以它也被称为“人类增强”。“人类增强”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体细胞的增强,就是改变人现有基因结构以增强身心能力,这种增强不会影响下一代;另一种是增强人的生殖细胞(精子、非受孕的卵子或受孕胚胎),进行基因筛查和挑选,赋予下一代优秀基因特质,这种增强会遗传给下一代^[5]。

就增强运动员来说,这在体育上并不是新话题。古希腊就有食用某种植物或动物器官提高运动成绩的说法。现代竞技体育的运动设施、装备、专门食谱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提高运动成绩、增强技能。运动员不断爆出兴奋剂丑闻,从反面也印证这种增强追求。但是,当前作用于人类基因的基因兴奋剂,代表了一种增强运动员的新方法。基因兴奋剂与传统兴奋剂的不同,直接通过肌肉中注射基因、注射转基因细胞(细胞被取出,注入人工基因,然后再放回体内)等方式实现,这些方式通过常规检测,比如血检或尿检,无法被检测出来。WADA 列出的常见的基因兴奋剂包括红细胞生成素(EPO)、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生长荷尔蒙(GH)、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肌生成抑制素(Myostatin)等。它们所起的作用包括提高运动耐力、加强肌肉力量、延迟疲劳等^[6]。虽然 WADA 对兴奋剂包括基因兴奋剂明令禁止,但有些运动员还是铤而走险,用药物和技术重新“组装”自己的身体。这不仅引发了关于安全问题的争议,而且也将体育运动的公平性推向舆论潮头。

WADA 禁止兴奋剂,理由可概括为 3 个:(1)兴奋剂对运动员的健康有害;(2)兴奋剂有碍比赛公平;(3)兴奋剂与运动的“本质”或“精神”背道而驰。除官方解释,很多学者认为允许使用药物会给运动员的生物体质带来危险,还需承担巨大的健康风险,因此允许使用兴奋剂是不道德的^[7]。兴奋剂对参赛运动员以及赛场内外都会带来负面影响,破坏体育公平竞争^[8]。在运动中使用兴奋剂,不仅是一种欺骗和作弊,也是对其他选手的不尊重。如果以这种非自然、非人化的方式赢得比赛,是对体育本质的败坏^[9]。特别是,一旦有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就会对其他运动员造成选择的压力,这终将导致类似军备竞赛那样的“药物竞赛”^[10]。

WADA 对基因或细胞兴奋剂界定遭到不少质疑。WADA 将基因或细胞兴奋剂定义为非治疗目的使用以提高运动能力的细胞、基因、遗传物质。这种在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之间的区分遭到很多人反对。尤其

是在治疗目的“修复”和非治疗目的“增强”之间划界便难以服众^[11]。比如,美国高尔夫球选手伍兹因为视力问题接受激光视力矫正手术,手术后发现视力不仅恢复了,而且运动状态也比之前更好,并接连赢下 5 场比赛。这是“恢复”还是“增强”呢?实际上,棒球、篮球等运动项目,都曾经有伤病运动员手术后比原来状态更好的例子。这说明在治疗和增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很多支持禁止兴奋剂的学者也认为这种说法。对于赞同人类增强的学者来说,既然治疗 and 增强之间的界限无法划定,那么就不应该禁止兴奋剂,这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在这种增强语境下,WADA 禁止使用兴奋剂的 3 个理由也遭到质疑。首先,使用兴奋剂并不必然伤害运动员。反对“人类增强”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兴奋剂或基因增强会给运动员健康带来伤害。但是,超人类主义者辩护说,今天的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平时训练使用兴奋剂并提高成绩的做法非常普遍^[12],只要在量上予以控制,就不会损坏运动员健康。况且,对运动员进行基因检测,也加大了体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如果无法成功检测兴奋剂,那么同样赛场也会有不公平。所以,关键问题在于监管,而不是严令禁止。

其次,基因增强并没有破坏体育公平,反而是平衡运动员自然天赋的不平等。美国游泳运动员索普有巨大的脚,这给了他相对于其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其他运动员凭借训练所无法获得的,所以,人的自然天赋本来就是不平等,使用兴奋剂可以平衡这种先天差异促进公平竞赛。那种认为正常运动员和基因增强运动员同台竞技就会产生不公平的说法也是夸大其词。如果运动员是靠神奇的药物赢得比赛,或者说他在某一天接受基因增强的医学帮助就一下子可以获胜,在目前的精英体育领域几乎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努力、投入以及牺牲仍然是体育比赛的关键因素,这不是通过“基因运气”产生的^[13]。南非残疾运动员皮斯托留斯(被称为“无腿飞人”)就是典型例子,他的义肢一度被认为有增强技能的效果,但皮斯托留斯坚称他的运动成绩来自艰苦训练和自我克服。由于论据不足,国际田联最终允许他参加正常人的体育比赛。所以,即使基因增强的运动员参赛,也需要经过艰苦训练才能取得好成绩,这并没有违背公平竞赛的原则。

再次,兴奋剂合法化,并不会破坏体育精神。职业运动就需要冒险精神以及选择愿意接受的牺牲。“因此,被禁止的兴奋剂物质和技术显然符合当今激烈竞争、高度技术化的体育世界的‘精神’,因为它们与体育竞赛的根本目的有关:扩展我们能力的极限”^[14]。这不是违反体育精神,因为使用兴奋剂是基于理性判

断的基础。体育与新科技的结合，是现代精英体育的发展趋势，如果要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就需要借助新技术的帮助，再加上成功带来的“聚光灯效应”，比如媒体焦点、地位、威望、金钱和人气等。有了这些刺激条件，基因兴奋剂问题，就是必然走向^[15-16]。所以，它不是不符合体育精神，而恰恰是现代竞技体育的必然结果。

2 桑德尔对生化运动员的批判

桑德尔《反对完美》探讨的主题是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在书中，他重点讨论“生化运动员”问题。这里的生化运动员指的是在生物化学条件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条件下“制作”出来的超人运动员。桑德尔的讨论涉及前文“人类增强”的两种情况。对运动员的基因增强，他不仅讨论 WADA 列出的基因兴奋剂问题，而且也思考通过基因工程“制造”完美下一代(新优生学)并赋予孩子优秀运动基因的可能性。他对作用于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增强予以了回应，对于被增强的生化运动员，桑德尔的态度是否定的。他说：“经过专业的训练和努力，击出 70 个全垒打是一回事；不用那么辛苦，借助类固醇或基因改良的肌肉也击出 70 个全垒打是另一回事。”^[17]桑德尔将两类运动员进行区分，他承认治疗和增强之间难以划出一条清晰界限，也认为运动赛场存在天赋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我们接受生化运动员的理由。与此同时，他也批判了超人类主义及其新优生学的立场。

对于生化运动员问题，桑德尔表达了 3 个反对的理由：第一，创造生化运动员的努力代表人类傲慢的技术控制欲。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从技术上武装人类，但今天人类以这种技术傲慢想要控制一切。他认为如果运动赛场出现基因改良的运动员，我们只会惊叹技术的奇迹，而不是运动员自身的优秀。“我们对成绩的钦佩，将从选手转到他的药剂师身上”^{[17]25}。一旦我们接受了基因改造，就意味着人类生活从此走向基因“军备竞赛”。正如美国电影《千钧一发》所反映的那样，未来父母对胚胎的性别、身高、对疾病的免疫力都可以挑选，甚至对智商都可以进行日常筛查。“更深层的危险是，他们表达了一种超级行动，一种重塑自然包括人性的普罗米修斯热望，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满足我们的追求”^{[17]26-27}。这种技术控制欲，不仅要求控制外部自然，还深入到人内在的生物数据。

如果通过努力并实现成功是运动的最高典范，那么基因改良的过错，就是逃避训练和辛苦。桑德尔将体育运动理解为人通过自然天赋展现的优秀。“基因改良运动员的真正问题在于，他们败坏了作为人的活动

的运动比赛，运动尊崇自然天赋的培养和展现。”^{[17]29}如果我们将运动与这种基因技术关联起来，最终成全的就是对技术的崇拜，而不是颂扬人的天赋。“这种控制的冲动错失，甚至可能破坏了对我们的能力和成就的天赋特征的欣赏”^{[17]27}。桑德尔承认人的天赋是不平等的。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平凡的运动员如果接受比乔丹更严格的训练，就能够赢得更高赞誉和更大合约^{[17]28}。桑德尔对天赋的理解更为深入，他认识到天赋的随机性、不确定性，这可以防止任何技术控制的傲慢，从而培养人的谦逊态度和美德。

第二，利用基因技术增强运动员，扭曲了技术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赞同基因增强的人认为，基因兴奋剂与运动员通过其他手段，比如特殊饮食、严格训练，甚至高尔夫球手伍兹视力矫正手术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在桑德尔看来，这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取决于提高高尔夫球手的视力是否更有可能达到完美，还是扭曲了运动在最好状态下被检验的天赋和技能”^{[17]31}。所以，视力改善的合法性不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无论是手术、隐形眼镜，还是其他。关键之处是，它是否无视个人天赋及其展现，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同样，对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改善、训练以及确定饮食标准，我们也应当以这个原则观察，如果这些项目不把运动员当人看，忽视人的自然天赋及其成就，就属于败坏体育运动。

桑德尔还重点讨论了耐克公司在美国波特兰市进行的“高原物”高科技训练实验。它利用分子过滤器从屋子里除去足够的氧气，模拟海拔 12 000~17 000 英尺高度的稀薄空气，招募 5 位优秀跑步者参与“高原低氧训练”。“高原物”训练将肌肉耐力增加到极限。教练还给“高原物”安装了检测运动员心跳速度、红细胞数目、耗氧量、激素浓度和脑波设备，根据运动员生理指标决定训练时间和强度。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随即禁止这种人工的高海拔训练。2006 年 WADA 伦理审查小组遵循这个逻辑，裁定使用低氧房间和帐篷(人工缺氧设备)违反“运动精神”，但遭到自行车选手、跑步选手和贩卖设备公司的抗议。桑德尔支持 WADA 的观点，但他认为只是重视运动员安全还不够，还应当让规则更能彰显运动的核心价值。“敬重运动比赛的公正，不只是遵守和执行比赛规则，而是这些被制定下来的规则，应该最能够彰显比赛的核心价值，并能够奖赏最佳选手的精湛技能”^{[17]36}。这里的核心价值，当然是指向运动员的天赋和能力。

第三，体育比赛将沦为公开表演。在桑德尔看来，运动与表演之间的差别，就像真正的篮球和弹翻床篮球之间的差别一样。在后者比赛中，球员能够跳得高

过球框灌篮。表演是凭借技巧夸大体育运动,吸引人注目,但却贬低了最伟大的运动员所展现的天赋或禀赋。“运动沦为表演,只是消遣的来源,而不是欣赏的对象”^[174]。桑德尔还拿艺术界和体育界进行对比。艺术界像体育界一样,实行科技改良艺术欣赏,很难不干扰老式规范和传统,尽管增强场面诱惑力,但观众必须重新适应,这也剥夺了我们纯然接近人类才能和天赋的权利。“体育沦为表演,在基因工程时代并非唯一。但是,它证明了提高成绩的技术,基因技术或其他技术,可能侵蚀颂扬天分和禀赋的运动场和艺术表演”^[1743-44]。所以,技术占据主导不仅破坏体育规则,而且侵蚀到了体育运动和艺术表演中对天赋的看重。桑德尔当然不是反对技术对体育或艺术的促进作用,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的使用是否侵犯了体育或艺术对天赋的欣赏,对卓越和优秀的追求。“如果人们真的相信,他们最喜欢的运动所使用的规则是随意的,而不是设计来引起和颂扬某些值得钦佩的才能和美德,人们就很难再去关心比赛的结果”^[1745]。如果体育比赛沦为了表演,仅有娱乐价值而不再追求卓越,那么运动本身就变味了。因此,桑德尔反对将体育变成表演,因为这样必然导致无视规则和界限,也失去对天赋的欣赏。

体育运动忽视人类天赋的展现,使运动员导向基因增强,将运动员变成超人,类似今天社会上讨论的新优生学的问题。在新生物医学技术时代,父母可以通过基因选择赋予孩子超强运动基因,以实现将来生育超人运动员的可能性。桑德尔指出这样做肯定会有道德问题。“珍视孩子为上天恩赐的礼物,就是全心接纳孩子的原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设计的物品,或父母意志的产物,抑或满足野心的工具,因父母对孩子的爱并非视孩子恰巧具备的天赋和特质而定”^[1745]。由此可见,桑德尔在新优生学上同样看到了父母对孩子天赋的干预,如果父母能够赋予孩子优秀运动基因,这难道不是对孩子未来生活的干预和控制吗?如果通过操纵胚胎创造体育巨星、超人运动员,那么人类的自主权和尊严何在?

3 自然天赋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

桑德尔将人类天赋与社会伦理价值关联起来,这就是他所谓的“天赋伦理学”^[1749]。精英化的体育只看比赛结果,导致对运动员天赋的漠视;新优生时代,生物医学技术不仅要求修改人类基因,甚至还要摆脱人类自然基础,向非生物化迈进。这种对天赋的忽视和工具化态度,反映人类自身控制意志的傲慢。桑德尔的天赋伦理学,并不是仅仅批判体育和技术社会对人类天赋的贬低,实际将天赋与人类团结、责任以及

共同体命运关联在一起。“倘若基因工程让我们无视基因彩票的结果,使我们以选择取代机会,人类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赋特质就会减少,或许还会因而看不出我们分享着共同的命运”^[1789]。通过天赋的随机性、不可控性,人类才有团结和对其他人的责任的观念。

WADA 伦理调查小组成员、运动伦理学家默里(Thomas H Murray)早在 1984 年论文《药物、运动和伦理学》中提出天赋与运动之间关系的想法,书中批判了完全从个人权利的立场理解体育运动以及使用药物的问题。援引亚里士多德幸福的概念,即人的好生活乃是自然资质包括身体能力、性格特征以及智力等方面的完善。“我们可以从这里推论,人有责任做他能力范围内的任何事情来完善天赋,放弃一切阻止这种发展的东西”^[10119]。默里将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完善论用来反驳运动员采用药物增强成绩的行为,“我们不应该使用非自然的手段来完善人的自然优秀——运动能力”^[10120]。当然,默里这里针对的是体育运动,他并不否认其他领域可以使用非自然的手段。比如,给人装上假肢,在篮球比赛中会认为破坏公平,但是在受了伤、需要打字的小说家那里应是允许的。所以,自然和非自然不能绝对对立。

默里^[18]认为基因兴奋剂会破坏自然天赋展现的优秀,而且还将导致“技术战胜能力”,使运动本身偏离方向。体育运动的优异表现既需要天赋,也需要那种天赋德性的完善。“我们对非凡的运动成就感到惊叹,这是对那位运动员所体现的天赋的惊叹,以及对塑造他们表现的努力、奉献、洞察力和其他道德上值得赞扬的品质的钦佩”^[19]。默里^[20]2018 年出版的新书《好运动》中,同样批判了使用基因兴奋剂的“非自然”“不健康”,创造超人运动员意味着人和技术界限完全模糊化,结果非人化的形式“超越今天人的身心能力”,完全败坏运动精神。所以,应关注比赛规则的公平以及比赛本身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它的结果。

2006 年 WADA 出台对人工低氧环境包括低氧屋、帐篷等的禁令,并将低氧环境是否增强成绩、损害运动员健康以及破坏体育精神的问题,提交给科学委员会审议。科学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它可能导致增强成绩,但对运动员健康是否构成伤害并不清楚。最终,伦理问题审查小组的报告认为,低氧环境破坏“体育精神”。具体包括 3 点内容:第一,它把体育精神与伦理学、公平竞赛、诚实、健康、成绩卓越、人格、教育、快乐、团队合作、努力、责任、遵守规则和法律、尊重自我和其他选手、勇气、团结等价值关联起来。第二,它承认运动员天赋差异,但并不认为天赋就是一切,对于使用任何特殊手段提高运动成绩来说,关

键看它是支持还是偏离运动的本质，即体育运动乃是自然天赋的展现和德性的完善。第三，它区分被动使用技术和主动使用技术。前者指运动员仅仅是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后者指运动员积极参与并将技术作为训练和竞争过程的一部分^[21]。

WADA 的报告如果从桑德尔角度理解，会发现天赋概念与官方报告之间基本一致。首先，像桑德尔一样，WADA 承认人的自然天赋的差异。并非所有具有生理学或解剖学优势的运动员都能成为伟大的游泳选手、投掷选手、滑雪选手等。拥有自然天赋，还必须完善这种天赋，即展现天赋并使其德性完善。这与上述默里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也非常相近。其次，运动员与技术的关系，桑德尔担心使用兴奋剂会扭曲运动，结果让技术主宰体育，而不是人的天赋展现。WADA 区分被动和主动使用技术。这种区分明显也是反对技术使运动偏离方向，甚至侵犯运动员的自主性。再次，就体育运动的本质来说，桑德尔认为使用技术武装运动，会使之变成只有观赏价值的表演，而消除追求卓越。同样，WADA 强调运动的首要德性就是在天赋差异基础上运动员的自我展现，竞争仍然是第一位的，运动的观赏性不能取代这个方面。

运动伦理学家罗兰(Sigmund Loland)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 WADA 对“体育精神”的捍卫。首先，罗兰肯定自然天赋在运动中的地位。像桑德尔一样，罗兰也接受人类自然天赋的随机性。体育天赋体现一个人的遗传倾向，在体育运动中发展与表型的相关表现。在自然彩票中，天赋的分配是随机的过程^{[22]69}。一方面，不能忽视人类在运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不能随意控制天赋的“自然彩票”。在技术与运动的关系上，罗兰支持 WADA 关于被动使用技术和主动使用技术之间的区别，包括今天的生物医学技术，它的使用都应当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包括人工低氧环境的营造、药物以及未来的基因技术，“这些手段不同于其他训练技术，因为它们在运动员不需要努力和控制在就可以实现成绩提升。其有效性，依赖于外在的专家的帮助。因此，它们应当称为专家主宰的技术”^{[22]115}。罗兰的观点是运动员使用技术不能超越展现自然天赋的限度，这一定要尊重运动员的主观意愿，而不是专家的意见。

桑德尔的天赋伦理学，将人的天赋与社会伦理价值关联起来，表达宽泛的对运动伦理的思考。同样，罗兰^[23]对体育精神区分了“狭隘理论”和“宽松理论”。前者指向现代精英体育追求竞争并获取胜利的运动理念，但为实现竞争获胜，这种精英体育表现出某种技术乐观主义，技术被看成运动员获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前文米阿代表的超人类主义就提供对狭隘体育理论的

辩护，他认为我们不需要禁止体育使用药物和基因技术。这种理解明显代表了一种狭隘立场。运动关联着更深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作为社会实践，运动有其自身的规范和价值，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更宽泛、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理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育是人类优异的具体展现，关键还在于，我们应当将这种优异理解为天赋美德的展现，只有这样理解，运动才是社会价值和理想的一部分。运动反映人的价值，运动反过来也可以帮助培养运动员的责任观念和公平的竞争意识。桑德尔把天赋概念与谦逊、责任以及团结等关联在一起，即罗兰的“宽松理论”，这不仅肯定了天赋在体育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而且都表达了一种宽泛意义的体育伦理思想。

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增强话语的流行，使得体育上也开始讨论创造超人运动员的可能性，有人甚至对之满怀期待。以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中对生化运动员的讨论为核心，思考体育运动应秉持的原则和所承载的价值。第一，运动员追求卓越和优秀，应当是运动员的自然天赋和努力的结合，这既不是天赋决定论，也不是技术决定论。如果比赛中运动员能够熟练掌握技术并取得好成绩，我们当然为之鼓掌，但如果遗忘或贬低人的自然天赋，或崇拜技术或药剂师，那就是另一回事情。第二，运动员使用技术提高成绩，在安全无忧的情况下，技术的使用应以运动员的能够自主对自己的成绩负责为限，而不是被动接受技术，或者被专家主使。第三，运动员虽然以追求卓越和优秀为目标，但成绩不是运动的唯一目标。运动技能的提高，当然是体育运动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应当理解体育运动蕴含的社会伦理价值，不仅要获得好成绩，也是天赋和美德的展现。关于这个方面，桑德尔提出的天赋伦理学，罗兰的“宽松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指引。正是从这些运动原则和价值上考虑，我们认为超人运动员并不值得期待。

同时，我们也不认同社会上人类增强的种种方案和规划。体育无法孤立于社会，一旦社会上人类增强被允许，体育上反对的理由就将遭到挑战。今天西方流行的超人类主义，要求超越人类条件，趋向后人类目标，甚至摆脱人类生物性局限。超人运动员就是从这种思想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它把人类完善论和技术乐观主义结合起来，这实质上不是真正完善人类自身，而是蔑视人类尊严和身体的价值。通过新优生学，我们还将后代拖进技术掌控范围，完全忽视人类出生的随机性和不可控性。正如桑德尔指出的那样，它将摧毁我们对后代的无条件的爱。桑德尔^{[17]49}借鉴神学家梅

(William May)的观点,将父母对子女之爱分成两种类型: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他指出父母对待孩子的爱,今天无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要么陷入溺爱和骄纵,要么将孩子看成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对象,并且只重视其成绩和结果。转化的爱拒绝孩子身上的“缺陷”,甚至无法接受孩子的天赋条件。就像梅^[24]所认为的那样,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不接受。“隐含在拒绝孩子中的自我拒绝,一种自我失败的感觉。”今天的人类增强和新优生学话语,不过是人类不愿意接受自身的无能感的反映。我们不愿意接受自然天性里的东西,而是将之看成要被改变或清除的“缺陷”。如果我们还把运动员理解为活生生的人,我们就应当接受其自然天赋,而不是以如何改变或增强为目的,将之变成超人。

参考文献:

- [1] THOMPSON H. Superhuman athletes[J]. *Nature*, 2012, 487(19): 287-289.
- [2] MIAH A. Genetically modified athletes: Biomedical ethics, gene doping and spor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
- [3] 朱彦明. 超人类主义对体育的挑战[J]. *体育科学*, 2018, 38(8): 92-97.
- [4] 费希. 超人类革命[M]. 周行,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32.
- [5] TRIVINO J L P. Gene doping and the ethics of sport: Between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2011, 1(1): 1-8.
- [6] 胡扬, 刘双虎. 基因兴奋剂[J]. *体育科学*, 2007, 27(4): 95-97.
- [7] SCHNEIDER A, BUTCHER R. A philosophical overview of the argumants on banning doping in sport[M]//*Values in S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E&FN Spon, 2000: 185-199.
- [8] SIMON R. Fair play: Sport, values, and society[M]. CO: Westview Press, 1991: 90-131.
- [9] TAMBURRINI C. What is wrong with doping[M]//*Values in S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E&FN Spon, 2000: 200-216.
- [10] MURRAY T H. Drugs, sports, and ethics[M]// *Feeling Good and Doing Better*. New Jersey: The Humana Press, 1984: 119.
- [11] MIAH A. Toward the transhuman athlete: Therapy, non-therapy and enhancement[J]. *Sport in Society*, 2010, 13(2): 221-233.
- [12] ROSEN D. Dope: A history of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in sport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oday[M]. London: Praeger, 2008: 194-196.
- [13] SAVULESCU J, FODDY B, CLAYTON M. Why we should allow 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s in s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and Medicine*, 2004(38): 670.
- [14] TAMBURRINI C. What's wrong with genetic inequality? The impact genetic technology on elite sports and society[J].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07, 1(2): 236.
- [15] BREIVIK G. Sport, gene doping and ethics[M]// *Genetic Technology and S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65-178.
- [16] MUNTHE C. Ethical aspects of controlling genetic doping[M]//*Genetic Technology and S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07-125.
- [17] SANDEL M.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ism[M].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
- [18] MURRAY T H. Sports enhancement[M]//*From birth to death and bench to clinic: The hastings center bioethics briefing book for journalists, policymakers, and campaigns*. New York: The Hastings Center, 2008: 155.
- [19] MURRAY T H. "Natural" talents and dedication—meanings and values in spor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2018, 1(6): 1.
- [20] MURRAY T H. Good sport: Why our games matter and how doping undermines the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63.
- [21] WADA note on artificially induced hypoxic conditions [R]. 2006(24).
- [22] LOLAND S. Fair play in spor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0.
- [23] LOLAND S. The ethics of performance-enhancing technology in sport[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09(36): 152-161.
- [24] MAY W. The pr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My take on some of its deliberation[J].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2005, 48(2): 231.